

B846
D64

4.84

解忧消愁小丛书

烦恼的 6 个“答不留”

张岱年 等著

农村读物出版社

1990·4

烦恼的6个“答不留”

张岱年 等著

责任编辑：任 鹤

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

肥城县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1/32 5.375印张 120千字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山东第1次印刷

印数：1—4300

书号：ISBN 7-5048-1275-7/Z·159 定价：2.50元

哲学家、心理学家、伦理学家、美学家专为本书读者奉献

认识苦恼摆脱苦恼的金钥匙

苦恼，是可以解除的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张岱年

怎样解除烦恼？这是古今中外的人们常常思考、探索的一个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研究引起烦恼的原因。我认为原因一般有这样几点：第一，生活中的物质需要不能得到适当的满足，这样就容易引起烦恼；第二，人际关系的复杂经常会引起矛盾，一旦出现矛盾也会引起烦恼；第三，作出了成绩，有了贡献，却得不到承认和肯定，烦恼也就随之而生。中国历史上的“卞和献玉”^①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烦恼容易发生。但是如果生活中总是烦恼，那么生活也就没有什么趣味了。因此，如何解除烦恼，从古到今、由中至外的许多思想家、许多学派都在积极地研究这个问题，寻求解决的办法。在中国，儒家代表人物孔子曾说：“乐以忘

^①卞和献玉、卞和，春秋时楚国人，相传他觅得玉璞，两次献给楚王都被认为虚假，先后被砍去双脚，楚文王即位，他抱璞哭于荆山下，王使人，琢磨其璞，果得其宝玉，称之为“和氏之璧。”

忧”。意思是说，虽有忧愁、烦恼，但是应该积极努力忘掉它。他认为，通过道德的修养，使人具有高尚的道德，就可以达到无忧无虑的境界。儒家还有一个典故——孔颜乐处。所谓孔颜乐处，是说孔子和他的弟子颜回^①有他们自己的快乐。孔子曾经称赞颜回：“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意思是说，颜回的生活虽然很困苦，但还是抱着乐观的态度。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庄子也追求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他们与儒家不同。儒家主张积极从事社会的活动，在其中达到无忧无虑；道家反对从事社会的活动，提倡摆脱世俗事情的干扰，从而达到无忧无虑，得到快乐。在西方，学者们也提倡追求快乐。古希腊的哲学家伊壁鸠鲁^②和犬儒学派^③都探讨如何得到快乐的途径。犬儒学派后来发展成为斯多噶学派^④，他们主张通过摆脱烦恼来得到快乐。伊壁鸠鲁和伊壁鸠鲁学派主张快乐主义，他们的快乐是精神的快乐，不是追求物质享受的身体快乐，他们要求人们在精神上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我认为，要摆脱烦恼，从忧愁中解脱出来，应该有正确

①颜回，渊，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孔子曾经称赞他说：“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②伊壁鸠鲁（Epikouros，前341—前270）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主张人生的目的在于避免苦痛，使心身安定，怡然自得，这才是人生最高的幸福。

③犬儒学派，古希腊一学派，把名利看作身外之物，认为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是不自然的，无足轻重的；号召人们克己自制，独善其身而无所求，认为这就是美德，他们的这种主张后被称作犬儒主义。

④斯多噶学派，古希腊罗马哲学的一个派别。这一学派要求人们宁静地观察生活现象，坚持不渝地执行严格的规则，教导人们视死如归，为证实真理不惜抛头颅，在不幸的逆境中坚定不移，战胜艰难困苦，蔑视享乐。

的态度，要考察和认识人的心理的基本规律、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规律，并把这些认识用于指导自己的生活和行动。这样，就可以解除烦恼了。具体说有下面几点：

第一，要正确认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而个人又是不能离开社会的。这里我想引苏东坡的词来说明这个道理。苏东坡的词是这样的：“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①”此词写作者夜饮归来，在夜阑风静的特定环境中发出的感慨和联想。他认为，个人身体的情况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他以此为遗憾，想象离开家庭、离开社会，驾一叶小舟到江湖之上、社会之外度过余生。但是，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个人的生存依赖于社会，个人的生活资料如食物、衣服等都依靠社会的供给，个人是不能离开社会的。同时，社会也要承认个人的基本权利。社会是由一个个的个人组成的，每个人都有他的基本权利，社会对此应予以肯定，而不能不予肯定，甚至剥夺，把人当成奴隶。既承认个人离不开社会，又承认每个人有他的基本权利，这样就可组成一个合理的社会，这样对于社会与个人关系的认识才可能是正确的。梁漱溟先生曾说，西方文化可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是：“个人本位，自我中心。”所谓个人本位，自我中心就是说只管自己，不管别人。实际上这是行不通的。因此，自我中心、无政府主义都是错误的。作为一个人，要顾及社会，如果一事当先总是以自我为中心，就往往会出现许多不如己意的情况，就容易烦恼了。正确的方法

①苏东坡词，为《临江仙，夜归临皋》

是：应该吸取教训，从社会整体考虑，想一想烦恼是应该有还是不应该有，这样就可以解除烦恼了。

第二，要正确认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物质需求，如穿衣、吃饭、住房、结婚、生孩子等等。除此而外，还有精神的需要，就是对于真善美的要求。一个人要追求真理，达到理想境界，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同时还要有审美的生活。如果一个人吃饱喝足，却无精神追求，这样的人生就没有多大的价值。因此，首先要解决物质生活的问题，要使物质生活达到一定的水平，挨饿受冻是不行的。但是，对于物质生活的要求不应过高。如果终日山珍海味、大鱼大肉也不好。物质生活过于丰富也有苦恼。物质生活之外还要有精神的追求，要有高尚的情操，要提高精神生活的水平。这样，生活才感到充实，精神也才充实和愉快，生活也才有意义和价值。孔颜乐处就是说，他们物质生活虽然很贫困，但精神生活却很丰富、高尚。不仅要有精神生活的追求，而且需要提高精神生活的水平，在精神生活中要超越小我，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大我，为民族而努力工作。这样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如上所说，正确地处理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也就可以摆脱烦恼了。

第三，要正确认识自由与必然的关系。人生就是要追求自由，但是现实社会上有许多必然的规律制约着人们。只有认识了必然，才能追求到自由，这也就是孟子讲的“求则得之”与“求无益于得”（求不必得）的关系^①。他认为，有两种事物，一种是“求则得之”的事，也就是靠主观努力就能

^① 《孟子·尽心上》中孟子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

达到的；另一种是求不必得的事，也就是受客观条件制约，不是主观所能决定的。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像研究学问、进行创造活动，作出贡献，提高道德素养、追求真理这一类的事情，自己努力就可以得到。这是求则得之的事；而像追求特殊的生活、高级的住房，追求显赫的地位和作官这一类的事情则受着客观条件的限制，追求也不一定得到，这是求而不必得的事。所以，孟子认为人们应该努力去做“求则得之”的事，而求不必得的事就不要去管它了。荀子也讲过同样的话。他说事情“有在己者，有在天者”，“在天者”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而自己努力也不一定得到的。他的意思与孟子一样。我认为，应该正确认识自由与必然的关系，正确地对待这两类事情，对于“求不必得”的事情就不要过分考虑。这样，就可以避免烦恼了。但是，客观条件是可以变化的，曾经是求不必得的事也可以得到了。对此，我们应该有更深一层的认识。西方有句话：上帝不负苦心人。中国旧社会也有一句类似的话：皇天不负苦心人。这两句话在提法上都有错误，今天应该改成：人民不负苦心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只要踏踏实实地努力工作，努力去干事业，最后还是可以得到人民的承认，社会的肯定的。有时在短期内，个人努力，工作成绩得不到别人的承认，同事之间不理解，但是，只要持之以恒地努力工作，最终是会得到承认和理解的。“人民不负苦心人”也可以说“历史不负苦心人”，只要个人努力，历史终究会有公平的评价。我们应该相信这个道理，这样就可以摆脱烦恼了。

第四，要有正确的价值观。什么是人生的价值，怎样作才是一个有价值的人？这些问题很复杂。要想摆脱烦恼，就必须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么，怎样的人才是一

个有价值的人呢？我认为，一个有价值的人应该具备两点：其一，要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意志、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是有价值的人的起码条件。没有独立的人格和意志，随风倒，甘心受别人的役使，这样的人谈不上有什么价值。其二，要成为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一种积极的力量，对社会能够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样的人才可以说是有价值的人。既有独立的人格，又对社会作出一定的贡献，那么社会终究是会肯定的，会给予适当的承认的。这样也就可以避免烦恼，从烦恼中解脱出来了。

总而言之，烦恼是可以解除的。只要有一个正当的职业和谋生手段，有一定的知识水平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对社会作出贡献，人民不负苦心人，社会总会给予承认的，总会给予个人正当的需求以满足的。这样，烦恼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因此，要想摆脱烦恼，就要积极努力，作出成绩，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对社会有益处的人。我们生活于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应该认清这个时代。现在的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于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还在探索之中，有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但终究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有本质的区别。我们处于这样的一个时代，如果过一二百年，回头来看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光荣、伟大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作出自己的贡献，在历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只要我们这样想，那么就会积极努力地工作，就会感到精神充实，心情愉快，烦恼和忧愁也就会自然解除了。而现在有些人强调“个人本位，自我中心”，这是错误的，它与个人的独立人格、独立思考有本质的差别。个人主义追求的是个人物质欲望的满足，这样不仅生活没有价值，而且也容易陷入烦恼之中。必须反对个人主义，反对对物质欲望的

过分追求，要重视和追求精神价值的实现，在精神生活中超越小我，把小我与自己的事业，民族的命运的大我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样就可以解除烦恼，保持愉快了。

“远虑”与“近忧”

——一位老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的呼吁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会长 陈元晖

农村读物出版社编辑（简称编）：陈老，我们出版社发现，近年来，很多外国著者撰写的关于排除苦恼的书大量进入中国，诸如韦恩·W·戴埃的《你的误区》、戴尔·卡耐基的《人性的优点》等，这些书在中国读者中广受欢迎。从对外开放、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角度而言，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可是，这也引起了我们对另一个问题的深思：中国的学者、专家，应该有这个民族自尊心、有这个力量，搞出更适合中国国情，更结合中国具体情况，因而也更受中国读者欢迎的解除苦恼的书。陈老是我国著名的心理学家、教育学家，我们也想就解除苦恼问题，向陈老求教。

陈元晖（简称陈）：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我提出。

编：我国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农民，也和其他人一样，会有各种不可避免的苦恼。帮助他们排除苦恼，促进广大农民的心理健康，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请问陈老，在这方面，应做哪些工作？

陈：我认为，首先应该重视农民心理学的研究工作和普及工作。我要在社会心理学会上呼吁加强对农民心理的研究，农民有什么样的心理规律，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是有一些从美国、苏联翻译来的书,可是,这些书并没有结合我国农村的具体情况。应该从多方面探讨农民的心理规律。譬如,农民的“怕变”心理,就值得很好地研究;又比如,各种“摊派”给农民造成的心理负担,也值得研究;心理学对于农民的家庭问题也应该予以关注,一个农民家庭之中,怎样和谐美满地生活,应该进行专门探讨;另外,心理学对于农村人际关系问题,也应进行研究,现在有很多谈人际关系的书,大多是谈城市人际关系,没有专门探讨农村人际关系,这是一个缺陷;还有,对农民的消费心理,也应加以研究,比如,有些商品,供应紧张,这就不一定是一个简单的供求关系问题,并不一定是因为钱比东西多,才造成一些商品供不应求,而是这里面有一个心理因素:人们怕火柴没有,怕盐没有,因而大量购买,这就造成一些商品供应紧张,并且形成了一种紧张空气。当然,上面列举的仅仅几个方面,农民的心理状态、心理规律,应从多方面去探讨。

对于农民心理,不仅要研究,而且还应该有这方面的出版物,我要在这里呼吁:应该出版《农民心理学》。我认为,至少应该有两种《农民心理学》出版,一种是专门给一切从事农村工作的人看的《农民心理学》,诸如从事制定农村各项政策者,从事农村宣传、文化、教育工作者及农村干部。

编:还应该包括我们这些编辑、出版农村读物的人。

陈:另一种是专门给农民看的《农民心理学》,两种《农民心理学》都需要既有较高的心理学素养,又对农民实际情况有深刻了解的人去搞。

编:陈老的话,对我们很有启发,出版《农民心理学》,农村读物出版社应首当其冲,我们一定将《农民心理学》尽

快地搞出来。也欢迎出版界同仁参与竞争，也编辑出版《农民心理学》，不仅应出版《农民心理学》，我国心理学界还应将已经发展起来的心理咨询事业逐步向广大农村推广。以促进广大农民的心理健康。陈老，我们认为，解除农民苦恼，不仅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党的“十三大”提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在广大农村普及教育，提高广大农民的文化素养和科学技术水平，这不仅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而且，对于开阔眼界、展拓胸怀，解除愚昧，扫除苦恼也无疑具有重要意义。陈老是我国著名教育学家，不知这方面，有何高见？

陈：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关于教育的说法，与以前有很大不同。过去有一种观念，认为经济是基础，教育是上层建筑。现在认为，教育的发展，应与经济的发展同步前进，不是先发展了经济，再发展教育。实际上，你搞经济建设，不搞教育，经济也发展不了。教育的发展，与农村的发展，甚至与农业产量的增长，密切相关。比如，农业中种子的改良，所产生的效果，就可以达到增加施肥所达不到的产量。不改良种子，再增加施肥，产量也还是有一定限度，这就需要通过教育来提高农民的科学技术水平。

编：依陈老之见，农村普及教育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陈：现在的问题是：经济最发达地区，不是教育最普及的地区，甚至可能是教育最不普及的地区。时常看到报纸上报导某某地方普及了教育，我看了以后，感到有疑问，在同一个报纸，报导了两条相矛盾的消息：说某省普及教育率最高，又说该省“童工”最多。“童工”多，怎么能说教育普及率最高呢？应该说，这是一种退步。就正常而言，在校学生人数应该有三个统计数字，一个是开学时候的数字。一个

是期中时候的数字，一个是期末时候的数字。报纸上披露的普及教育率，使用的是开学时的数字，可是到了期末，剩下一半人就不错了。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十几岁的孩子，可以赚到大学教授的工资，于是，就不去读书。我的家乡福建沿海，是经济发达地区，可是，读书人不多，文盲在继续增长。怎么办？农村普及教育问题怎么办，应该说，这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严重问题，不能让这种现象发展下去。

编：我们认为，本书的读者，特别是那些“童工”家长，应该深刻地体谅、理解陈老这一片忧国忧民之心，把目光放得长远一些，不要因为能图一些眼前的“近利”而影响自己子女的全面发展、素质的提高。正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陈老，在农村教育中，还有哪些问题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陈：我下面要谈的，是农民再职技术教育问题。再职技术教育，同职业教育概念不一样。现在的职业教育，大多是学校系统的职业教育，就是初中毕业后，再进入一个职业学校学习。这种职业教育，多半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一个中学生，升不了大学，又不能就业，于是便进入职业学校学习。这种职业教育，不是“十三大”讲的职业教育。“十三大”讲的职业教育，旨在培养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我认为，应该把职业教育看得长远一些。不要认为，仅仅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职业教育，一方面应包括学校系统的职业教育；另一方面也应包括再职技术教育，就是再职人员不离开工作岗位，而接受教育、培训，后者应占更大的比重。举办再职技术教育，我们在延安老区有很好的经验。当时党中央专门成立了一个与中宣部平行的中央干部教育部，由洛甫（张闻天）同志任部长，特别重视再职教育。现在出现的一

种倾向是：只重视城市的、工商业的职业教育，而不重视农村、农业的职业教育。农民中的文盲，应接受文化补习；初中毕业当农民者，应该接受再职技术教育。

编：在农村普及教育中，有不少新的知识领域需要去开拓。我们不仅需要一套比较好的农村普及教育体制、形式，还应有不断被充实更新的教育内容，以调整、更新农民的知识结构，不知在这方面，陈老有何高见？

陈：现在设置的课程，包括一些大学的课程，有些是几十年不变，上百年不变，这很不适应形势的发展。就农村初言，农民需要不需要生态学知识？需要不需要人口学知识？我认为很需要。欧洲有一位学者谈到，现在世界面临三大威胁，一个是战争，一个是生态，一个是人口。生态严重失掉平衡，大量环境污染的存在，为人类生存造成很大威胁。我在瑞士访问，看到那里几乎人人都知道绿化环境、栽花、栽树的意义，没有一个小孩随便折花枝；无论花园、公园，绿化程度非常高，几乎全是草坯，没有一寸黄土，这就与我们的国家很不一样。我们的教科书中，这方面知识就很少。又比如，人口学知识，也应该在农民中普及，我国从去年到今年之间，人口增长了一千多万，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是一千多万人口，我们一年生一个国家。节制生育，控制人口，这个问题在农村比城市更加重要。贯彻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比城市难度更大一些，有些农民，宁愿受罚也要生，头一胎生了女孩，他认为女孩子不能“传宗接代”；第二胎生了一个男孩，他认为就此而止不太保险，怕万一有什么意外事故夭折了，还是不能“传宗接代”；直到生了第三胎，他才认为有了传宗接代者。

编：我们认为，陈老之言，至关重要。保护生态、保护

环境，节制生育，控制人口，这些都不是靠国家颁布几项政策，制定几条法规就能够解决的，应该将生态学、人口学知识，向广大农村普及。

陈：我下面要谈的，是向农民普及未来学知识。农民，要树立农民的理想，这个理想，不应该是空泛的。应该对农民的未来，我国农村的未来，有具体的描述。比如，21世纪的农民就是要不断地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

农民教育，不仅是应包括以上几个方面，还应该包括很多方面。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是“世风日上”还是“世风日下”

——道德风气与苦恼

北京大学教授 周辅成

党中央“十三大”宣布的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将给整个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带来脚踏实地的革命，它将带来工农业的稳定而又快速的发展。这个发展的实现，一方面固然要依靠党中央的路线、政策的正确，一方面还要依靠上下两方面（包括农民在内）的辛勤努力，特别是要依靠一股正派的道德风气。

道德风气，也并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神秘风气，它就生长在人民中，是人民自己培养的风气。几千年来注重人民意志的哲人、志士、仁人，早已把这道理说得十分清楚了。英雄，也只有在符合人民意志的时候，才能是英雄。中国最早的一本古书《书经》，就已指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聪明，自我民聪明”，这就是说，世间一切有价

值的東西（包括道德風氣）都在人民手內，是人民所親自創造。這個道理，是明明白白、千真萬確的。但不料歷史上也竟有一些思想家，硬不相信這點，要反對這點，竟把道德風氣之厚薄，看作是“自乎一二人心之所响向而已”，于是把道德風氣也弄得神秘莫測，高不可攀。這完全是錯誤的。

不過，我們對農村中的道德風氣，也要有一個非常清晰而又非常正確的估計和認識。否則，複雜的問題會弄得我們十分迷亂，会把本是好的道德風尚，看作是壞風尚；或者把本是過時的風尚，看成是良好的道德風尚。

我們不要忘記，我們是在社會主義改革中，有改革，就會有新老之分；在道德風氣上，就會有新老道德標準之分；由於這個區分，社會上就會出現新道德與舊道德的衝突。

這種新老道德的衝突，自古即有，不過於今更劇烈而已。我記得我幼年身逢五四運動之後，在農村中，就親自聽到一些專教四書五經的“子曰店”冬烘老師們說：“什麼陳獨秀，什麼胡適之，他們就是造幾千年老祖宗的反；認父作賊，認賊作父。我們說萬惡淫為首，百行孝為先，他們竟然改過來說：萬惡孝為首，百行淫為先”（這些話，當然都是冬烘先生替改革派捏造的）。這種道德思想的衝突，不可謂不劇烈，但就其深度與廣度而言，只怕還不能和當前社會主義改革帶來的衝突相比。五四運動前后的新老道德思想衝突，主要是在知識分子當中，在部分政治社會生活中，多半在城市中，在思想意識上。也正因如此，它還為我們留下很多大問題未解決，尤其是全社會中、農村中的社會道德、政治道德、以至家庭道德上許多問題，還需要更深的革命實踐才能逐步解決。

從前有人說過，從婦女解放的程度，可以測量全社會

被压迫人民获得解放的程度。我们今天也可换个角度来说，从农村道德风气改变的程度，可以测量整个社会道德风气改变的程度。一个重视社会道德风气的人，如果不重视农村的道德风气的冲突和变化，那将会犯根本性的错误。

我们既然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就要学会迎接和解决从改革和进步中出现的冲突和问题。新与旧，随时都在冲突，但各时代新与旧的冲突所根据的社会背景却各不相同。所以，我们生长在社会主义时代，决不能从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前去找求解决冲突的仙丹灵药。过去的经验可以参考，但其对我们今天的作用万万不可夸大。否则，我们将在有意或无意的情况下为旧势力作辩护，甚至阻碍进步。

农村中的道德风气，自从实行社会主义的开放与改革后，确实有了无可比拟的变化。然而人们对这些变化所作的解释却未必都相同，有的人甚至还抱抵触的态度，觉得改革把他平日所认为好的东西革掉了。常常你说这样好，他便说这样坏。这就成了新旧之争。我随便举三个常挂在这些人口中的例子——先从浅近的例子说起：

一是公共汽车到农村后引起的挤车问题。这本是城市产物，现在也输入农村了，也成了村民常谈的题目了。以前乡下老乡亲们坐骡车到集市或走亲戚，总是先让年纪大的爷爷奶奶坐好座位，然后父母叔嫂兄弟姐妹，最后小孩坐在大人身上，秩序井然，快乐融融，毫无争吵现象。但今天，公共汽车一来，谈方便，确实方便了，也比坐骡车马车舒服得多，但坐车的人换成了互不相识的人，相互态度却大变了：似乎什么秩序、道德，也都不起作用了：大家都不怕老年人骂坐车不讲礼节，于是汽车一到，蜂涌而上，不管什么老幼病残，谁有力气，谁就上车，车门未开，大声叫喊“开门”，

自己把老弱挤倒后上了车，又大声喊“快关门”。上了车以后，你还可听到车上的人骂个不停：骂售票员，骂别人不向前走，甚至还可听到殴打的声音，热闹极了。一场城内演的戏，又在乡下演。乡下的一些关心世道人心的人，当然也会随着有的叫声大叫：改革把大汽车送来了，也把坏风气送来了。

如此场面，说没有道德风气问题，当然是奇谈怪论。但应该如何对待，确实值得研究，大概不要公共汽车不行，不要道德风气也不行。

再举一个乡亲们最常讲，最有兴趣的例子，就是农村男女青年的趋势问题。赶时髦，确实有人最喜欢，但确实也有人最讨厌。有人就这样说：“改革使咱们乡下儿女们的心变了：开始是羡慕从城市中带来的牛仔裤、喇叭裤、长头发、烫发，接着是穿耳、口红、大领口衬衫，这还不够，也学着城市儿女，干完活就去找朋友谈情说爱。”这些，确够一般老前辈们议论纷纷了。但儿女似乎是有意要和老一辈开玩笑似的，他们要结婚，要几大件，有些父母是疼爱子女的，也不惜倾家荡产，让儿女得到新的物质享受；然而最使老头子们担心的，还是儿女们好不容易结了婚，有的孙儿孙女，忽然儿女又另有所欢，要闹离婚，或者要闹分居，这等于天降大祸于人了！这不能不使老头儿们坐在一起，开口便叫“人心不古”、“人心败坏”了。于是咒骂城市坏风气，吹得长期安静的农村家庭变得凄凉难忍，什么牛仔裤、几大件，这是罪魁祸首、是洪水猛兽，以前抚养儿女，一心想着“养儿防老”，现在老了，儿女心变了，同时还要父母共同担负将来不免破产的悲哀。改革，真改得老头的道路越走越窄，儿女们的婚姻，也漂浮不定了。